

明末地圖與公牘－地域性政書的出現

日本 學習院大學 外國語教育研究中心

大澤顯浩 OSAWA Akihiro

緒言

- 一 『江西輿地圖說』：明代末期的官府地圖
- 二 『觀風便覽』：地域性政書
- 三 『彙輯輿圖備攷全書』：明末地理書籍的可能性

餘言

緒言

明末的地理書呈現新的發展。此並非為當時出版量增大而引發的量變，而是因追求實用性及博識並積極利用官方公開資料所產生的質變。此種變化使得其能夠超越傳統框架並得以新的發展。

嘉靖之後，因韃靼及倭寇對策被明王朝作為首要問題，使得軍事以及地理的關係更為重視，而『大明一統志』所現「詞章之學」的缺點亦因此為世矚目，同時其體現的編志時若遇地理知識不足，必要時可由行政角度來把握地域實情的傾向亦為後人所重視並接受。如此，因軍事緊張關係以及追求行政實用等的背景，使得對乖離現實的「詞章之學」進行批判的觀點漸行於世。

嘉靖年間所作軍事書籍，雖多以北疆・海防作為專題議論，然因其時地理書結合行政並講求實用，這使得奏議及文集等的有關鹽法及漕運的論議亦為之收

錄，也促使了收錄議論邊防・海防等軍事問題的新種地理書的出現。

於嘉靖中葉問世的羅洪先『廣輿圖』，其正確性予以後續地圖的影響甚大。¹而『廣輿圖』本身又在嘉靖末年增補了桂萼『皇明輿圖』中有關各地方形勢論等的相關文章。約著於萬曆二十年代的盧奇『職方攷鏡』六卷以及汪縫預『廣輿考』亦是趨於此種時勢所編，可見當時因軍事緊張關係所產生的影響確實存在。採擇實用書以及政書的記載，地理書內容中前所未有的加入了「詞章之學」之外的新事物，這為明末地理書的產生開創了新的局面。²

一 『江西輿地圖說』：明代末期的官府地圖

作為現存明末地圖冊的典範，當推北京國家圖書館所藏萬曆年間絹本彩色『江西輿地圖說』以及鎮江市博物館所藏『南京府縣地圖』。上述兩種資料照片皆收錄於『中華古地圖珍品選集』（哈爾濱地圖出版社，1998）以及『中國古代地圖集（明代）』（文物出版社，1994）等古地圖集。³

『中華古地圖珍品選集』所載『江西輿地圖說』（第 89—91 圖）為萬曆年間所制絹本彩色江西布政使司圖・各府圖・各縣圖，其圖說明稱「圖說與圖配合記述了該地歷史沿革・地理特徵・險要以及風俗等情況」作為現存的附帶圖說的萬曆時期的山水圖式地圖，其資料價值貴重。『南京府縣地圖』（第 88 圖 a・b）的說明亦稱「每圖均附圖說」，圖說雖未被影印，但其與『江西輿地圖說』當為同樣類型的圖冊。『中國古代地圖集（明代）』，則將上述兩種地圖冊分別稱之為『江西全省圖說』（第 62—67 圖）以及『兩淮地區府縣圖冊』（第 68—73 圖）。⁴

上述圖式在被稱作山水圖式地圖或是全景圖式地圖之中，皆可稱為現存最古之物。作為地方區劃的山水圖式地圖為歷代持續描繪的事實，則可由『中國古代

地圖集（清代）』（文物出版社，1997）收錄的康熙年間『江西省府縣分圖』（北京，國家圖書館所藏，第 20 圖）以及『雲南輿圖』（中國科學院圖書館善本室所藏，同第 5 圖）等地圖⁵，此外的『澳門歷史地圖精選』（華文出版社，2000），以及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廣州市檔案局等所編的『廣州歷史地圖精粹』（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3）所收錄的種種地圖得以推測。

除此之外，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所見明寫本『揚州府圖說』一卷⁶和『泉州府圖說』（美國國會圖書館藏）⁷等內容亦與上述資料的性質類似。另『千頃堂書目』卷六，收錄有關山東的『萊陽地理圖說』一卷·『蓬萊地理圖說』一卷等同名文獻八種，王庸以之為海防圖書。此等資料亦例證了各縣級單位製作同樣性質地圖學說的存在。⁸

此類地圖的原型，如海野一隆「繪畫としての地圖」⁹一文中所言，或與賈耽「海內華夷圖」相關，或與北宋景德四年（1007）向各地派遣畫工並製作的「景德山川形勢圖」（『玉海』卷 14）類似。海野一隆「繪畫としての地圖」一文中介紹的日本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所藏明代寫本『輿地圖』正是直接汲取這一傳承的產物。

或為布政使司編纂的『江西輿地圖說』的現存形式為山水圖的事實，可以聯想到當時兵部職方司集約各地的地圖形式，並非為方格圖，而是山水圖。『大明一統志』以及各地方志所描繪的地圖雖有精粗之差，其基本皆為山水圖方式地圖的理由，或許是各級衙門編纂的地圖原本即是山水圖式，抑或是方志為了力求繪畫雅緻所致。

此等方志地圖反映官僚眼光的學說，見於張哲嘉「明代方志的地圖」，¹⁰其稱，方志附錄的地圖，正是身居官府的官僚們眼中所見世界的寫照，相較於『廣輿圖』方格地圖的正確性，方志地圖則更強調了官府以及學校等所擁有的政治以及文化

的權威。

羅洪先『廣輿圖』方格圖明確分開各省的境界，只有地名和二十四種單純的記號，這與『大明一統志』地圖沒有記下境界之點對比鮮明。民間編纂出版的『大明官制大全』五卷本以及陸應陽『廣輿記』¹¹，皆基於『廣輿圖』的方格圖的理由，是因為其意識到力求精確的地圖，而將『廣輿圖』作為標準來加以利用。而其無法利用衙門所繪的地圖也是理由之一。

『江西輿地圖說』所付圖說當為『中華古地圖珍品選集』所錄第91圖。右半部分即泰和縣圖，左方則為如下由九行各十六字組成的泰和縣「圖說」：

泰和縣 衝 繁 刁

泰和濱贛水，而邑原隰畏潦，鄉谷畏盜，地
執然也。訟蟬興而賦獸逸，剽課稱艱。且路
當吳楚閩越之周，館人津吏頗繁苦矣。西
十里為破塘口，正贛水所擊射，數十年來
洪濤襄圮，江勢將遶邑背東徙。民虞蕩墊
日皇皇，奔訴孔棘。多方籌濟，近日七里隄
始告成，民賴無怨。若乃崇雅砥即文獻雲
蒸，則自昔號彬彬云。

此文內容基本上，與『紀錄彙編』所錄趙秉忠『江西輿地圖說』泰和縣條之「繁簡考」一致，可以認為其源之於趙秉忠所纂萬曆時期的實際資料。¹²

趙秉忠為萬曆二年進士，福建甌寧縣人，或為康熙時期『甌寧縣志』卷六「選舉」中所提到的身為江西饒州府樂平縣知縣的同名人物。同治時期的『樂平縣志』卷六，「職官」中亦提到，其於萬曆九年十一月到任。此外，趙秉忠著作中曾提到萬曆六年未設置的建昌府瀘溪縣，該著作可以確認萬曆七年之後的編撰。其文最

初概說全省，此後記錄南昌府以下各說。其中有如下記載：

廣昌縣 僻 簡 次淳

邑山多田寡，賦輕易完，路通閩粵，亦一郡要害之區。自流寇肆虐，民始告困。大抵廬舍吠澮，土著僑居相半，而慵撲險健，主客異形，故有鷹養虎衛之患。若山川之磅秀清，駛其人文蔚發，民到于今稱之矣。

瑞金縣 次僻 簡

瑞距郡東三百六十里，陳石嶽岑，綿江榮帶，邑介其中。土瘠民儉，田家苦作，不詭干訟，事稱簡省。特為汀潮北指之衢，且鹿谿羊迴，私鹺盛行，贛民汀商，勾黨為姦利，法幾飢矣。

上述記載所示各府州縣狀況與傳統方志相異，敘述更為直截。即，其採用官廳文書體例，針對各府州縣列出相應的「最繁·次衝」等位次，甚至還記錄類似對地方行政業務的評價—「吏治評語」，並加以說明。¹³這些被作為圖說的材料，很可能是布政使司所整理的資料。或許當時江西全省都進行著同樣的工作，而其成果恰是以這種地圖冊形式而問世的吧。

『紀錄彙編』，更導入了與趙秉忠『江西輿地圖說』類似的王世懋『饒南九三府圖說』這本江西地方行政參考書籍。對於『饒南九三府圖說』的編纂，王世懋在「三郡地圖說跋」中如是談：

直指使者，代天子省方，以輿地觀民風，以繁簡稽吏治職也。今使者東來趙公，皂蓋所至，必命其郡縣長吏，圖其地境，而系說於圖後，以稽其繁簡衝僻難易。饒（饒州）南（南康）九（九江）三郡，世懋所轄也。

這種各府州縣對所轄地境進行繪畫，並於圖後加之說明，考察地方的繁簡·衝僻·難易的圖說，可以說是上呈御史的圖說集成。由饒州府，南康府，九江府三府所轄之點可見，就王世懋履歷而言，當為其分守饒南九道時所編。王世懋分守饒南

九道的在任其間，據王世貞「亡弟中順大夫太常寺少卿敬美行狀」（『弇州山人續稿』卷一百四十），當為萬曆四年～七年，若是此時的編纂則稍早於趙秉忠『江西輿地圖說』的編撰時期。東萊趙公，或為趙耀，其字文明，山東萊州府掖縣人，隆慶五年進士，由庶吉士，並歷任陝西·江西巡按御史。¹⁴

王世懋的跋文中記載，因需考察各府州縣「繁簡·衝僻·難易」，巡按御史趙耀命各府縣知事上呈所轄地圖及其解說。現存『紀錄彙編』雖未附錄地圖，而按「三郡地圖說」及其跋文所敘，地圖繪畫完畢後才附加解說，這正是由巡按御史的立場出發，為了地方行政的必要而作的編纂。¹⁵「四庫提要」提及『饒南九江府圖說』云：

『三郡圖說』一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王世懋撰。世懋有《卻金傳》，已著錄。是編乃其官分守九江道時所作。三郡者，一饒州，二南康，三九江，皆所隸也。凡地之衝僻，俗之澆淳，民之利病，皆撮舉其大端，而不以山川，古蹟，登臨，題詠為重，蓋猶有古輿圖之遺法。未有世懋自跋，稱直指使者東萊趙公命郡縣長吏圖其地境，而系說於圖後，既而以所說失實，屬世懋改定之，故以圖說為名，而不具其圖云。¹⁶

文中稱，『三郡圖說』對交通要地與否，風俗輕薄淳朴與否，人民的長處短處等皆舉其要點，而傳統的山川舊蹟，科學合格者，赴任官僚，以及詩歌等則未為重視。此大有古輿圖法之遺。

『三郡圖說』雖只針對江西饒州·南康·九江三府，但其對各府州縣進行「最繁·次衝」等位次分類，並錄有對地方行政業務的評價，更加之說明。例如：

饒州府 最繁 次衝

……，謂其地沃土平，然濱大湖，連二省。其民刁而好訟，其賦繁而多逋，

其盜賊時作而弗靖，重以藩封在焉，奸宄易生，於江右稱劇郡云。

餘干縣 最衝 最繁 刁

……，蓋水陸交會之衝，舟車供億，日不暇給。厥田上上，歲多二熟，山宜茶，貿易南昌。民富而奸，好隱匿積逋負，佐猾吏為欺舞，蠹弊糾結，不復知有上法。地廣民眾，盜賊出沒，而黃坵埠乃其淵藪。習俗已成，即廉明之吏，一旦居之，未易挽也。

各個府縣往往在記敘其地理位置之後，加述行政上之注意事項。而這些言論，往往又都是交通的狀況，適合的作物，胥吏的情形，盜賊的有無，人民的貧富以及風氣等等，與『大明一統志』所謂「詞章之學」以及顯彰鄉里·人物的方志記載明顯不同。¹⁷

值得一提的是餘干縣記載後半部分「民富而奸，好隱匿積逋負，佐猾吏為欺舞，蠹弊糾結，不復知有上法。地廣民眾，盜賊出沒」的內容，除了外來的統治者以及管理者能以此種觀點進行編纂之外，一般的地方志是不會出現這樣的說法的。「四庫提要」提到的「不以山川，古蹟，登臨題詠為重」也是理所當然的，因為這與當地住民為了顯彰鄉里而編纂的地方志在性質上存在著根本的差異。

或許某家書肆會借用名人的名聲作為招牌，然而原本並不是以宣揚某地名勝古蹟為主的著作，當然也沒有必要名人效應的輔助。事實上，根據王世懋的「行狀」以及墓碑銘所提到的內容，我們可以斷定『饒南九三府圖說』是王世懋本人的編著。祁承@（火業）『澹生堂藏書目』史類第十四，圖志，記載：

『饒南九三郡輿地圖說』〔一卷，王世懋，紀錄彙編本，王奉常雜著本〕

可見至少有兩種版本存世。墓誌銘提到，本書在王世懋在世當時已經刊行，由此我們可以推測該書在當時是有所流行的。¹⁸

『饒南九三府圖說』雖為王世懋的編著，但其衙門公牘般的內容，讀之毫無

詩興可言。但到底是怎樣的群體會有這樣的要求呢。這並不是衙門內部爲了應付急用而作的鈔寫，二度得以版刻，其實已經超出了行政官僚的需要數量，並可能廣爲士大夫所用。得以版刻這個事實，也使得某些公牘擁有了衙門內部保存之外的廣泛意義。¹⁹

總之，利用公牘而編撰的這些手冊，就官僚而言，不僅是當地行政上的必要，而且還可以了解作爲談論時務的前提的，與方志記載所不同的地域實際情況。而事實上『饒南九三府圖說』以及『江西輿地圖說』，與顯彰當地人物而作的地方志的記述迥異，其是以地方行政觀點出發，對各縣相關情況作扼要記錄的備忘錄，表現亦是直截了當。

此外，此兩部地圖冊編纂於萬曆初期的江西，與『大明官制』的增補和『新刻京本華夷風物商程一覽』的編寫雙方有關係的是浙江紹興山陰出身的陶承慶，他作爲江西新喻縣縣丞並於萬曆十年左右就任。而幾乎同一時期『華夷總覽大明官制』在萬曆二年至八年間，於江西由時任袁州知府的鄭惇典的校正之下編纂而成的事實也相當耐人尋味。²⁰

收錄上述兩書的『紀錄彙編』本身是收集關於明代政治，儀禮書籍的叢書。可見當時的關心所在，正是如何對所謂掌故學問進行反映。其中收錄有關江西地方行政資料之點，其原因之一或是『紀錄彙編』由江西巡按御史陳于廷參與，並在江西刊行，而就其他方面而言，當時地方政治的狀況自身成爲出版對象，地域實際情況越來越得到注目等因素亦是主因之一。

此類編纂著作利用公牘之點，可能當時存在公牘與地域管理較爲相關的見解。類似『大明一統志』的摘錄那樣的，與傳統地理書方志相異的地誌在這個時代被要求產生，當然其必定會利用與以往不同的資料。利用公牘原文，使得與傳統地方志相異的地理書得以出現。這也是對地域意識的變化所生的結果，換言之，

這種新生的地理書，與其稱之為地理書，不如稱之為地域性政書更為合適。

二 『觀風便覽』：地域性政書

萬曆時期，各地出現了被稱為『觀風便覽』的有關地方政治的著作。其大都為四卷左右的簡本，與通志性質相異。明清時期的書目中可以確認曾有山東，河南，貴州各省的『觀風便覽』存世。

『行人司重刻書目』	史部 地理	貴州觀風便覽一本
『脈望館書目』	史類 地志	山東觀風便覽四卷
『千頃堂書目』	史部 地理類上	山東觀風便覽四卷
『也是園藏書目』	史部 職掌	山東觀風便覽四卷
『述古堂書目』	卷四 掌故	山東觀風問俗便覽四卷四本
『四庫全書總目』	史部 地理類	兩河觀風便覽四卷

上述書目皆分類為史部的地理或職掌。錢曾的『也是園藏書目』及『述古堂書目』，亦將之分類為職掌、掌故，可見其已經與一般地理書有所區分。實際上與各省的通志相比，其皆非長篇累牘的大部，而都是四卷左右的簡本，又因其與地方志性質相異，與其說是地理書不如稱之為政書更為合適。『行人司重刻書目』，是行人司的官員於各地巡視之際所購書籍的收藏目錄，其有萬曆壬寅（30年）的序文，可見至少萬曆中期之前『觀風便覽』之類的書籍已被編纂。

其中，所謂北平善本所含的『兩河觀風便覽』殘三卷，與『山東觀風便覽』四卷（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所藏）現存。『四庫全書總目』卷77「地理類雜記 存目」中，著錄『兩河觀風便覽』四卷〔江蘇巡撫採進本〕，其文云：

兩河觀風便覽四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不著撰人名氏。中有稱萬曆二十年者，而所列宗藩一門尙無福府，則神宗中年之書也。分十門：一曰圖考，二曰封域，三曰官秩，四曰宗藩，五曰賦役雜差，六曰戶口，七曰河防，八曰驛傳，九曰儲積，十曰兵防。大抵鈔撮案牘爲之，而於河南掌故一一具詳。較地志諸書羅列山川，侈陳人物，濫載藝文者，較爲近實。特其大者多見於史，而小者亦備載於通志，不免爲已陳之故牘耳。

「四庫提要」中提到，『兩河觀風便覽』大多爲公文的鈔錄，而河南掌故尤詳，其與地方志中羅列山川人物等詩文不同，更具體反映現實情況。然其大事多見於史書，而小事亦備載於通志，結果「四庫提要」不得不將之評價爲「已陳之故牘」。

「四庫提要」將之內容「分十門，一曰圖考，二曰封域，三曰官秩，四曰宗藩，五曰賦役雜差，六曰戶口，七曰河防，八曰驛傳，九曰儲積，十曰兵防」，並將各門分歸於「覽」（事實上還存有十一「礦洞覽」），且「大抵鈔撮案牘爲之，而於河南掌故一一具詳」。現存的『兩河觀風便覽』缺第一卷，現存只是第五賦役以後的部分。²¹

然而，「四庫提要」所謂「已陳之故牘」的評價，現在看來其卻是非常貴重的資料，『觀風便覽』於名勝人物爲主的詩文以及顯彰鄉里爲主的地方志不同，其提供了有關地方行政的具體史料。「四庫提要」雖將之分歸地理類，然而就其內容而言，與其稱之爲地理書，不如將之稱爲相關地方行政制度的政書更爲合適。

地方志往往在「兵防」或「徭役」之條中記錄有關驛傳的記載，「城隍」之條又有關於城周的記載。然而『兩河觀風便覽』中，由更爲詳細的數字構成的記載，其統一的格式，與其說從各種地方志收集而成，更應該將之理解爲其本來就源自布政司衙門等統一掌握的數據。對於地方志而言，『兩河觀風便覽』記錄的「極衝·

次衝·稍衝」等驛傳的等級毫無意義。此外涉及到由國家管制的礦山防備等設施的記錄，也與普通的地理書毫無關係。

此外，現存的『山東觀風便覽』四卷，刊有萬曆辛巳（九年，1581）季秋山東布政使司左布政使楊一魁之序。楊一魁為山西安邑人，嘉靖 44 年進士，萬曆 11 年閏二月辛酉，由山東左布政使任河南巡撫（見『明督撫年表』卷四，河南）。其各卷內容簡介如下：

卷一 封域，官秩，聖賢封典，藩府，河漕

卷二 田賦，均徭，里甲

卷三 兵防，海防，屯營，城池，墩堡，班軍，礦洞

卷四 驛傳，鹽課，馬政，稅課，水利，海運（膠河附），水陸道里

因其序作於萬曆九年，編纂時期則較『兩河觀風便覽』為早，大致於『江西輿地圖說』相近。

然而，河南省的此種「故牘」又為何得以出版，且如『四庫全書』中江蘇巡撫採進本那樣，被收藏於本省之外的地方呢。或許當時的文士已經意識到，此類地方行政的微細記錄才是與顯彰鄉里的地方志所欠缺的價值所在了吧。在此就『兩河觀風便覽』的性質而言，「四庫提要」提到的所謂，「於河南掌故一一具詳。較地志諸書，羅列山川，侈陳人物，濫載藝文者，較為近實。」的說法，其重要意義正在於對地方志的比較。所以，『兩河觀風便覽』之所以為世所需，其所具載的「掌故」制度之中，恰顯示了地方志所不能提供的地域實際情況。與地方志相比，其之所以得到「較為近實」的評價，更說明了其與地方志相異的現實性。考量其與傳統地方志相異的此種性質時，不由聯想到同一時期『江西省大志』以及『山東經會錄』等可以被稱為地方行政資料集的刊行。

由之可以認為，『兩河觀風便覽』，是作為布政司衙門等的官僚的實務手冊而

編纂的。當時，因有很多議論時務的經世文章問世，議論地域的現實問題的編著，在繼承了種種書籍記載的同時也製作了一系列的經世學系譜。『兩河觀風便覽』之類的手冊或許為這樣的製作提供了作為前提的情報資料。與地方志異類的地理書得以編纂，也意味著這種超越詞章之學的經世類地理學的萌動。例如，明末復社的指導者張溥，曾提出通過整理兩京各省通志・方志以及賦役全書來了解各地的戶口・錢穀・形勢沿革等的建議（張采『知畏堂文存』卷五，論略題辭）。²²

可見這些編著的共通之點在於，現實政治中對局部地域的注目與關心。其中，既有巡按御史在各地就行政上的需要而主導編纂的，也有地方官因個人的關心所在而編纂的。由此這類編纂具有了利用公牘這樣一個重要的意義。王世懋的『饒南九三府圖說』以及趙秉忠的『江西輿地圖說』，甚至『兩河觀風便覽』等，不僅可以說其就是公牘的出版，此外還有諸如「猥雜煩瑣，與書吏之簿籍無異」（李天麟撰『楚臺記事』七卷）²³以及「所載公牘為最詳」（許伯衡撰『滇南雜記』二卷）²⁴之類的評論存在。

萬曆『鄖臺志』十卷（中國史學叢書三編第四輯）²⁵雖被分類為地方志，而其內容卻與方志迥異。鄖臺雖是指鄖陽提督衙門，但並不存在行政區畫的鄖陽地區，也沒有鄖陽布政司以及鄖陽按察司。可見，在當時其並不是作為方志而被編纂的。嘉靖二十六年彭遵古編纂舊志，鄖陽兵變之後，因撫治鄖陽而被起用的裴應章又於萬曆十八年重修此志。裴應章序中稱「一其事權，明其職掌」，可以看出其認識到，確立統率所轄三省的五府八州五十一縣命令系統的重要性。也許是兵變之後得以編纂等特殊因素的影響，其與方志不同也並非沒有理由。

全十一卷，其內容分為建置，輿地，憲體，宦績，官屬，版籍，兵防，儲餉，奏議，著述上，著述下。而將公牘分類為敕諭，勘劄，關防，符驗，旗牌・儀節，公移等項目並記錄的卷三「憲體」以及卷九「奏議」等不僅數量眾多且各具特色。

此外記載各衛所月糧的卷八「儲餉」亦與普通方志相異。而個人的著述則有卷末的讚頌裴應章業績的「裴公考績序」，另諸如「去思碑記」以及「德政碑記」之類的與行政直接有關的文章亦多被收錄。因與行政區域無關，所以其中既未列記科舉合格者，亦未表彰孝子節婦。²⁶這是由官僚編纂的以官僚利益為主的著作，極端的說，其是為以裴應章利益為主而編的著作。

原本就與行政區域無關的鄖台地區的地理書得以編纂本身，正是因為其對現實地域的關切所致。『鄖臺台志』所記載的恰是鄖陽提督管轄之內官僚所面對的問題，可以說這部『鄖台志』的編纂正是體現了對現實地域的所必要的關切。

然而，河南省的這部「故牘」出版之後，卻被『四庫全書總目』稱作江蘇巡撫採進本，其被他省收藏的事實，又如何去理解呢？這也許正如『饒南九三府圖說』以及『江西輿地全圖』被『紀錄彙編』所收錄那樣，或許當時的文士已經意識到，此類地方行政的微細記錄才是與顯彰鄉里的地方志所欠缺的價值所在了吧。『兩河觀風便覽』被「四庫提要」稱為：

大抵鈔撮案牘為之，於河南掌故一一具詳。較地志諸書，羅列山川，侈陳人物，濫載藝文者，較為近實。

其與地方志對照的性格亦顯示了其的重要意義。當然，『兩河觀風便覽』被河南之外的地區所需的理由，難道不正是因為其體現了地方志所無法記載的地域現實情況嗎。若是一般的地方志，是不需要這些繁瑣的數字以及唯官府公牘才有的俗不可耐，無味乾燥的事件記錄的，其需要的是作為歌頌吟詠對象的當地名勝·舊蹟·名人等雅致的要素。『廣輿記』之所以於明末重復再版，也正是因為它包含的這些內容所致。而在變革的時期，雅致的鄉里形象對於處理實際行政問題毫無意義可言。當時，進行實務處理所必要的，只有參閱無味乾燥的事件記錄，即地域的實態所在。如此可見，『兩河觀風便覽』，應是作為布政司等地方衙門官僚的實務手

冊而得以編纂的。

那麼，為何公牘得以用在地域性的編寫著作中呢？總志記載的變遷裡可以看到對以『大明一統志』代表的「詞章之學」的批判。其背景是以日用類書為代表的，重視博學多識和實用性的明末思想潮流。並且，其根底即是務實的態度。這種對現實的關心是與經世致用的思想息息相關。當時，把學問應用實際政治這樣的形式，地理學肯定迎接著一個幸運的時代。其中，明末地理書的編纂活動有各種各樣的方向的可能性和多樣化，這使得產生了以前的書籍分類所不能收納的一系列的書籍。具有地域性的政書既未錄於『直齋書錄解題』·『郡齋讀書志』等之中，也是以往從未被分類的著作。

明代發達的利用公牘的有關衙門的編著，被分為職官類官制之類。可能是試著將地域作為地方衙門。雖然『兩河觀風便覽』記載地域的範圍有限制，但還是被分為職官類官制之類的內容。

提到『鄖臺志』，恐怕當時不得不將之分為地理書之類，其實，考慮到當時編寫的有關各種各樣衙門掌故之書的存在，例如『南廳志』·『南京太僕寺志』等，可以說『鄖臺志』也是一部有關地方衙門的掌故之書。有關衙門的掌故當時被大量製作，其中，可能或是應該有關心著地域製作的掌故之書。

這種地域性的政書的出現表示的是對地域的意識格局的變化。原來方志包含的內容為某一地方的褒詞，即「佳景，奇跡，名人，勝事」等的表彰，²⁷無法超越『大明一統志』的「詞章之學」的結構。而政書包含的內容是跟「詞章之學」有鮮明對比的公牘掌故。這樣，以超越「詞章之學」的結構的形式利用衙門內部文件，例如“吏治評語”的從行政方面來寫的地域評價，填補了地方志尋求的某地的表彰和地域實際情況的隔閡。隨著對『大明一統志』批判的出現，使用地方

公牘掌故的編著呈現也是當然的結果吧。因此，向經世致用的意向，與對在總志裡能看到的「詞章之學」的批判並進而產生了地域性政書。

此後，章學誠在他的「方志向立三書議」上主張，編寫地方志之際，立“志·掌故·文徵”的三個部門而傳古人之意。其中之一，即是掌故按照律令典例體例製作。掌故源自朝廷制度，所謂「部寺卿監之志，即掌故」，諸如『通典』·『唐會要』·『元典章』那樣的典章制度的編著。『晉乘』·『春秋』以來，方志作為某一地方的全史的傳統被摒棄了，今人所謂的方志已經不能算是方志。²⁸

爲了要恢復「志」的全體性而爲「史」，是需要不僅事(志)和言(文徵)，而且需要對現實的關心的。從現在的觀點提起公牘是很自然的。而領先於章學誠的這種方志議論的形式，並產生於明末的這些使用公牘記述地域的地域性政書的編寫事實，饒有深意。

雖然跟章學誠不同，明末地方性政書沒有構築理論，但正是由於現實的課題以及對同時代史的關心，才使得使用公牘的地域記述得以出現。其是與稱揚地方的方志有根本差異的編著。方志本身局限於『大明一統志』的「詞章之學」結構，又本就很少關注現實來加以記述，以至其無法接近新的掌故之學。離開了方志所不能克服的「詞章之學」，於超越以前的意識格局的地域之掌故的新容器之中，在關注地域這個觀點的指引之下，明末的經世思想終於問世了。

由於廣泛地認識到明末官方情報的有用性，日用類書和路程書也同樣將之收錄，這樣接受信息的底層擴大了。²⁹譬如，宋代由一種民族意識，使得各地留下了由之製定的「地理圖」·「禹跡圖」等石刻地圖。³⁰ 這些地圖當時還沒有受到商業化的影響，可以說是中央政府掌握的地理信息的一種公開和利用。

那麼，當時衙門內部文件爲何被地理書籍裡收錄呢？可能是因爲在當時社會上有對那種情報的需求吧。如編纂『大明官制大全』五卷本·『江西輿地圖說』

等書籍的時候，能看到民間出版業者起了不少作用。³¹好像在衙門架藏的官方編寫的文獻不夠滿足當時的需要。並且，對官方情報的關心的高漲也成爲了尋求出版這類地理書籍的契機。

從信息利用的觀點來看，明代末期經世致用的意識就是促進博學多識和追求實用性的起因，從而導致了一些官方情報的公開及利用。當時，重視應付實際情況的實用性，所以，因意識到『大明一統志』的「詞章之學」的缺點，以致產生了對『大明一統志』的批判。而意識到博學多識，則收錄在像日用類書的體系性的項目裡。如何整理知識之點，使得編寫地理書的構思產生變化，與以前有差異的地理情報開始得以編寫。

對出版公牘的需求表示因地方官僚干預出版而得以展開。以前提到出版文化的底層的擴大時，談到科舉應試的事爲多，其實，可以說由於行政手冊類型的書籍的產生卻製造了另一種不同形式的高峰。

三 『彙輯輿圖備攷全書』：明末地理書籍的可能性

明代末期由於編寫地理書的質變，出現了新類型的地理書籍。這可以說在與地方行政連結的形式的實用性的認識，加以明末當時的軍事的緊張，而在地理著作上產生了經世觀念。例如出現了郭子章『郡縣釋名』·吳國輔『今古輿地圖』等的歷史地理研究，以及茅瑞徵『禹貢匯疏』·朱謀@（土章）『水經註箋』等的古典研究，其尋求普遍實證性的背景，似乎在於經世致用的觀念所帶來的對實用性的追求吧。

隨著對於普遍性的追求，出現了超越以往中華世界觀的視線。萬曆末期，人們尋求新知識，例如或者記載各地的緯度或者採用利瑪竇世界圖之類。例如潘光

祖『彙輯輿圖備攷全書』凡例所言，超越經書的「俾人知九州之外更有如是之大」的想法也產生了。

關於顧炎武『肇域志』直接地受到『彙輯輿圖備攷全書』的影響之點，筆者曾經著論敘述。³²因為『彙輯輿圖備攷全書』並非『大明一統志』般的巨著，所以易於利用，加之，在某種意義上綜合明代末期的總志各種各樣的特色，對顧炎武來說一定有用。³³

潘光祖『彙輯輿圖備攷全書』十八卷，繼承程百二『方輿勝略』和陸化熙『目營小輯』記載。由於這本書博引『大明一統志』以下的各種書籍，其扉頁刊登的參考書名如下：

一彙全部統志	一彙纏度分野	一彙廣皇輿考
一彙全部會典	一彙周官職方	一彙目營小輯
一彙歷代風土記	一彙列省郡志	一彙方輿勝略
一彙歷代地理志	一彙正皇輿攷	一彙廣輿記
一彙利西來經緯略		

並且，目次之後開列採錄諸書目，其中有『水經注』，『山海經』，『萬曆武功錄』等地理和歷史方面的書籍，更有『占候紀略』，『食物本草』等跟地理和政治方面沒有關係的著作。再者，關於各縣編戶的里數等數字繼承『目營小輯』，並從『方輿勝略』繼承世界地圖和各省地輿圖說等。這些證據可以認為其是明末地理書之一大集成。根據李雲翔『彙輯輿圖備攷全書』序云：

雖古有「職方記」·「地圖志」，至我明有『大一統志』，嗣是有『廣輿圖』，諸紀述莫不犁然備矣。然僅載都省郡邑之會·山川風俗·華夷人物已耳。至於阨塞·要害·戶口·錢穀有裨國事者，漫弗及焉。予於操觚之暇，一遐想之，莫不以此為憾。而有志未逮。適盟兄傅少山，以潘大參海虞先生

未竟之『備攷全書』示，予觀其略，不止記山川名勝，資紙上臥遊，實有關經濟者。予愧續貂，從『一統志』而損益之，詳以諸紀述及予之耳目所見聞者。自神京以及各省，至邊陲·要害·海運·漕河·鹺政·閩隘·錢穀，有裨有戰守者，古今人物·忠臣·孝子·義夫·節婦，有關風化者，悉編入帙，如指諸掌。

據說傅昌辰(少山)給李雲翔看潘光祖未完的原稿，李雲翔更是「越三寒暑五脫稿」，使之完成。李雲翔閱稿時說，「不止記山川名勝，資紙上臥遊，實有關經濟者。」甚至對「戰守」·「風化」亦有關心。看來，李雲翔序里提到的對軍事性的關心已經從萬曆後期呈現。考慮到明末緊迫的軍事狀況，此點較易理解，可以看出當時文人的關心趨向還是較有深度的。

傅昌辰作為版築居是南京知名的一家書肆，潘光祖是陝西臨洮衛籍人，天啓五年進士。實際使之完成的李雲翔則生平不詳，可能是一個沒有功名的文人。可以說，這部『彙輯輿圖備攷全書』是書肆(傅昌辰)和文人(李雲翔)的合作。

其中提到的各縣條列如下：

祥符縣〔漢浚義，東魏梁州，後周汴州，宋改此，編戶一百七十五里，全設二丞二簿○煩劇衝疲軍衛雜處難治○周府并郡王五十二同城，分守大梁道駐筈，有宣武衛·河南中衛·護衛，大梁馬驛遞運所〕

陳留縣〔在府治東五十里，古有莘，秦改此，編戶四十八里，無簿○次衝民淳，設莘城驛○睢水在縣東北四十里，東經睢州達寧陵〕

『彙輯輿圖備攷全書』凡例批評以前的諸書沿革不備，而用大字書寫各州縣名，不過，除了歷代的州縣名以及「煩劇要衝疲軍衛雜處難治」的吏治評語以外，其跟『目營小輯』的記載幾乎同樣。『目營小輯』對於建置沿革的記載打破了象『大明一統志』那樣按照各府彙集各州縣記載的形式，關於這個形式陸化熙在「目營

小輯引」中稱「創立義例取府州縣，提頭序列，如仕籍然」，各個州縣另起一行列舉之點好像仕籍一樣。³⁴雖然『彙輯輿圖備攷全書』直接是承繼『目營小輯』的記載形式，更可以說其繼承了『大明官制』的形式。³⁵

其他的『彙輯輿圖備攷全書』的各項目亦與『大明一統志』相似，雖有與「詞章之學」的性格相通之處。不過，其收錄了來源於『方輿勝略』的許多的地圖和各種各樣的經世議論，這導致了『彙輯輿圖備攷全書』的記載並不同於單純的『大明一統志』的省略本。可以看到其對教化和軍事這些當時的問題所寄予的特別的關心。這個凡例同時指出了，『大明一統志』只是登載郡的沿革，並沒有刊登稅糧食·屯田等內容，對『大明一統志』的內容進行了批評。³⁶

加之，利瑪竇向明末中國社會傳達的新的知識，由「坤輿萬國全圖」代表的地理知識，雖也被當時馮應京『月令廣義』，程百二『方輿勝略』，熊明遇『格致草』，方以智『物理小識』等，跟利瑪竇有直接的交友關係的人們和天主教信徒的著作所提到，可是除了一部分的身為天主教信徒的士大夫以外，接受新知識的程度無從可知。³⁷章潢『圖書編』卷 29 作為一說介紹「輿地山海全圖」，不過，其同時以對抗意識製作了基於佛教系「南瞻部分州圖」的「四海華夷總圖」，³⁸崇禎年間『皇明職方地圖』更將利瑪竇圖的世界知識評為「議而不論」而置之不理。

39

反之，『彙輯輿圖備攷全書』凡例提到，以前的地理著作只有十三省·九邊諸輿圖而已。可是這本『彙輯輿圖備攷全書』以利西泰進呈的四大部州輿圖併纏度為卷首。並卷頭收錄利瑪竇的世界圖，打算把新的世界認識告諸於眾。

一，諸刻止有十三省·九邊諸輿圖耳。是集則以利西泰之進呈四大部州輿圖併纏度為首，俾人知九州之外更有如是之大。

這裡提到的是引用『方輿勝略』的地圖，不過，可以說實用性的追求超越了以前

的地理書的結構而帶來了對新奇的知識的容納。並且『彙輯輿圖備攷全書』是由南京的一家書肆出版，不象馮應京指授的『方輿勝略』那樣直接和利瑪竇有關係。此事反倒表示了明末社會蘊藏較寬廣的接受新世界知識的潛在能力。可是，時至清代許多地理書籍受到查禁，所以接受利瑪竇圖新知識的可能性也由之喪失。

餘言

相反的是，在日本利瑪竇世界圖成爲一種文化的時尚，其構思及設計得以紮根。18世紀末，長久保赤水的「地球万国山海輿地全圖說」眾所周知，而且誠如海野一隆教授所介紹的那樣，以利瑪竇世界圖爲代表的西歐世界地圖對於江戶時代的日本的影響，甚至波及了通俗啓蒙讀物。以平住專庵『唐土訓蒙圖彙』『山川輿地全圖』(享保四年，1719)爲首，產生了配合民族圖譜而出版的正保刊「萬國總圖」，以及貞享五年(1688)刊的石川流宣『萬國總界圖』。

此外「萬國總圖」系的世界圖被收錄於『節用集』之類的通俗啓蒙書籍，『節用集』是日本江戶時代流行的一種辭典，帶有日用類書的性格。例如元祿十一年(1698)刊的『頭書增補大成節用集』『世界萬國總圖』和享保十二年(1727)刊『大字萬圖節用福字通便』『世界萬國人物總圖』等。這種世界圖還在十九世紀反復出版，到了蘭學(從荷蘭傳入的西洋文明)系世界地圖登場之後才結束它的作用。⁴⁰

處於中國文化邊緣的江戶時代的日本，利瑪竇圖的新知識雖然引起了佛教界的排斥，但是第一次接觸之後卻以一定的方式得以紮根下來。明末中國雖有接受的契機存在，可是結果卻無法容納這樣的新知識。此種差異，可能是由於統治者的嗜好，也可能是因爲科學而使得知識受到限制。但是，接受新的世界形像，這不單單是知識而且還需要如何理解世界的觀念，如同相信不同的宗教那樣，已經

形成堅定世界觀的中國士大夫不易接受新的世界形像也有其道理所在。正如對天主教宣教師的不同態度那樣，如果不象日本的信奉天主教的大名（封建諸侯）那樣，皇帝和士大夫是很難接受新的世界形像的。

在日本，利瑪竇圖系的世界地圖與異國的風俗圖相映成趣。明末刊登世界地圖的書籍，對外國風物的關心則少之又少。觀念上世界地圖也是爲了把中國作爲中心而對天下所作的描繪，是不會基於對於外國的關心而作。

據說稅安禮的「古今華夷區域總要圖」爲了在華夏的周邊增加了夷的情況，而保留了賈耽「海內華夷圖」的內容，基本上，明末清初的漢民族社會的世界地圖也差不多按照華夷圖方式將西洋系地理知識放在中華的周邊部分，始終未能打破傳統的結構。⁴¹甚至可以說，新知識未經紮根就迎來了清代，傳統的中華知識結構還是得以保存了下來。

清末，張之洞『書目答問』將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分類爲兵書。這表示了在中國的傳統意識中，掌握地理知識則意味著掌握一種擴展兵法的特殊技術。當時還不算讀書人作爲學問應該學習的知識。更不用說中華世界以外的地理知識了。

作爲傳統中國地理書中的最高傑作，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的成就，並不是對世界的認識，而是對地域的理解，以及天下古今的歷史地理的考證，這也顯示了中國的傳統性的地理書在本質上所存的界限。

（2007年10月10日）

1 關於繼承『廣輿圖』中的方格地圖的書籍，參看海野一隆「『廣輿圖』の反響」（『研究集錄 大阪大學教養部』人文・社會 23，1975）。

2 參見大澤顯浩「『詞章之學』から『輿地之學』へ—地理書にみえる明末」（『史林』76—1，1993）。

3 『中華古地圖珍品選集』（哈爾濱地圖出版社，1998）以及曹婉如等編『中國古代地圖集（明代）』（文物出版社，1994）。

4 『中國古代地圖集（明代）』雖稱之爲『江西全省圖說』，但按後述圖說內容，其似當作

『江西輿地圖說』。

5 『江西省府縣分圖』（『中國古代地圖集（清代）』（文物出版社，1997），第20圖）以及『雲南輿圖』（同第5圖）。

6 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193頁。

明寫本 不著撰人姓氏。圖用彩繪，府圖後爲江都·瓜洲·儀真·泰興·高郵·興化·寶應·泰州·如皋·通州·海門·都十二圖，各圖之後，附說一篇。說敘沿革，稱明爲國朝。「通州圖說」云：往甲寅，倭夷犯順。此嘉靖三十三年事也。

7 李孝聰編著『美國國會圖書館藏中文古地圖敘錄』（文物出版社，2004）91頁。

8 王庸『中國地理圖籍叢考』（上海商務印書館，1956修訂）甲編，明代海防圖籍錄116頁。

9 海野一隆『東洋地理學史研究（大陸篇）』（清文堂，2004）所收。

10 黃克武主編『畫中有話：近代中國的視覺表述與文化構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所收。

11 『大明官制大全』五卷本和陸應陽『廣輿記』都繼承『廣輿圖』中的方格地圖，可以參見海野一隆『『廣輿圖』の反響』。『大明官制大全』五卷本是萬曆年間建陽鄭氏寶善堂刊。關於『大明官制』和『廣輿記』各種版本，見大澤顯浩『『廣輿記』の明版について』（『史林』77-3，1994）以及大澤顯浩「地理書と政書一掌故のあらわした地域」（『明末清初の社會と文化』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96）。

12 『紀錄彙編』卷208，趙秉忠『江西輿地圖說』

泰和縣 最衝 最繁 刁

泰和濱贛水，而邑原隰畏潦，鄉谷畏盜，地勢然也。訟蝟興而賦獸逸剽課稱艱。且路當吳楚閩越之周，館人津吏頗繁苦矣。邑西十里爲破塘口，正贛水所擊射，數十年來洪濤襄圮，江勢將遶邑背而東徙。民虞蕩墊，（日皇皇奔訴）堤障之謀，岌維孔棘哉。（多方籌濟，近日七里隄始告成，民賴無怨。）若乃崇雅砥（即）節文獻雲蒸則自昔號彬彬云。

（ ）內爲『紀錄彙編』未錄內容，下線部分爲僅見於『紀錄彙編』本的內容。可見『紀錄彙編』本成書之時，堤防尙未完成。

13 關於「吏治評語」，參見大澤顯浩『『肇域志』の成立』（『東洋史研究』50-4，1992），大澤顯浩『『詞章之學』から『輿地之學』へ—地理書にみえる明末—』以及劉錚雲「衝·繁·疲·難—清代道府廳州縣等級初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4-1，1993）。後來，章學誠樹立方志理論，把「員缺繁簡」的條目收在吏科掌故（『章氏遺書』卷27，「湖北通志檢存稿」四，湖北掌故目錄）。

14 『明史』卷225，趙喚傳以之爲趙喚之兄。因張居正奪情而左遷。按乾隆期『掖縣志』卷四「政治」云：

趙耀，字文明，隆慶辛未進士，由庶吉士，擢御史按江西，以忤張居正歸。後擢兵部郎中，歷藩臬清正率屬。

『國榷』卷81「萬曆三十七年四月丁卯」，亦有相同內容記事。

15 另巡按御史參與的事例，還有如李孝聰「中國古地圖の再會」（藤井讓治·杉山正明·金田章裕編『大地の肖像—繪圖·地圖が語る世界』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2007）中介紹的，清初順治年間山西巡按御史獻上的『山西邊垣圖』·『山西三關邊垣圖』（台北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所藏）。

16 『四庫全書總目』卷74，史部，地理類存目，『三郡圖說』一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17 方志人物傳對明末鄉紳來說，早就成爲一個很重要的關心對象。參見井上進「方志的位置」（『書林的眺望』平凡社，2006，原載「山根幸夫教授退休記念明代史論叢」汲古書院，1990）。

- 18 王錫爵「南京太常寺少卿洲麟王公墓誌銘」(『王文肅公文草』卷十)
其閩部，三郡圖說，窺天外乘，二酉委談，學圃雜疏，前已行人間。
- 19 或許與其說府州縣的行政長官，不如說佐貳官以及胥吏對之更為需要。
- 20 參見大澤顯浩「地理書と政書—掌故のあらわした地域—」(『明末清初の社會と文化』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96)。
- 21 參見大澤顯浩「『兩河觀風便覽』について」(『汲古』23，1993)。
- 22 參見井上進「方志の位置」。井上進亦以為明末的經世觀點推進了對「胥吏簿牘」類型方志的利用，而其前提則正存在於公牘得以刊行的狀況之下。可見與傳統方志相異的思辨方式促進了對公牘的利用。
- 23 李天麟撰『楚臺記事』七卷(『四庫全書總目』卷80，職官類存目)。
- 24 許伯衡撰『滇南雜記』二卷(『四庫全書總目』卷77，地理類存目)。
- 25 萬曆『郎臺志』十卷(中國史學叢書三編第四輯，台灣學生書局景印 1987)。卷首編委會提要稱，景印原本為台灣中央圖書館所藏之「海內外孤本」，然日本名古屋市蓬左文庫亦有一本收藏(『名古屋市蓬左文庫漢籍分類目錄』史部，地理類，45頁)。
- 26 方志列傳中，重視對節婦的表彰這個事實，在『陰鷺文圖說』「常須隱惡揚善」以及『太上感應篇』「蔽人之善」等所列舉的故事中已盡詳其實。
『太上感應篇集注』(『藏外道書』第12冊，『道藏輯要』本，康熙四十五年序)
萬曆間，江陰縣修縣志，一廩生有才與其事。偶見二節婦有其名而無實蹟可考，遂削之。城隍廟道士，夜夢二婦人泣訴云：「某等一生苦節，死載縣志。某生不訪氏行表章之，反并氏名削去。」神曰：「此生合登黃甲，既輕節義，當削其祿籍。令蹭蹬諸生。」二婦泣拜而去。生聞之斥為妄語，明年果考劣奪廩，遂憤鬱而死。(「蔽人之善」第36葉表)
- 此外，黃正元纂輯『陰鷺文圖說』(道光戊申(28年)重鐫(羊城味經堂板))也舉了同樣的故事。(「常須隱惡揚善」第四冊，貞集第2葉)
明萬曆間，江陰修縣誌，一廩生，負盛名，延之秉筆。見二節婦有其名而不載事蹟，遂削之。城隍廟道士，夜見二婦，一從正門入，一從東角門入。城隍降階迎接。二婦訴曰：「我等一生苦節，死載縣誌。某生不訪氏行表彰，反將氏名削去。」神曰：「此生合登黃甲，既輕節烈，當削其祿籍。」婉諭二婦回。蓋二婦一從子爵受封，一民人妻也。道士以告生。生叱為妄。明年，果考劣奪廩，憤鬱而死。
- 文中節婦鬼魂口稱「不訪氏行表章之，反并氏名削去」，認為應到當地調查並表彰事蹟，其向城隍道士的申訴似乎頗有道理。然而，對實際的方志進行編纂之際，廩生「有其名而無實蹟可考，遂削之」的態度，在明末這應是相當普遍的。不過，清代善書則認為此是由參與方志編纂的秀才怠惰調查所致。這也從另一方面看出善書對明末才子的輕薄風氣的批評程度。
- 27 黃鞏『方志論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所引康熙『黎城縣志叙例』(149頁)
志與史不同，史兼褒誅，重垂戒也。志則志其佳景·奇跡·名人·勝事·以彰一邑之盛。
- 28 關於章學誠的方志學，參見稻葉一郎「章學誠の地方志編修と方志學」(『人文論究』53-2)。
- 29 『大明官制』的有些記載，被陶承慶編『新刻京本華夷風物商程一覽』以及余象斗『三才萬用正宗』地輿門·官品門等日用類書收錄。
- 30 參見增田忠雄「宋代の地圖と民族運動」(『史林』27-1，1942)以及海野一隆「在鎮江宋代石刻『禹迹圖』觀覽記」(海野一隆『東洋地理學史研究(大陸篇)』(清文堂，2004)，井上充幸「東アジアにおける楊子器圖の展開」(『大地の肖像—繪圖·地圖が語る世界』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2007)。
- 31 現存『大明官制大全』五卷本多為建陽鄭氏寶善堂刊本。關於『大明官制』的各版本的研究，參看大澤顯浩「地理書と政書—掌故のあらわした地域—」(『明末清初の社會と文

化』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96）。然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所藏『大明官制』五卷本的卷末木記為「隆慶戊辰仲春吉旦重刊」，也許五卷本得以編纂的時間甚至可以追溯到萬曆以前。

32 參見大澤顯浩『『肇域志』の成立』（『東洋史研究』50-4，1992）。

33 王重民『中國善本書目』史部，地理類（187頁）『彙輯輿圖備攷全書』十八卷

此原刻本極少見，李長庚序原署，「崇禎六年歲次癸酉」。

本稿所用為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所藏清初順治七年三吳大紫堂重刊本，而崇禎原刊本，在日本則藏於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

34 陸化熙『目營小輯』引

萬曆己亥（27年），讀書婺州公署，取『一統志』參對當代郡縣，多不相蒙。且積縣為郡，為省直，合省直成天下，所係匪細，而列款僅儕于古蹟・物產，亦似本末無辨。乃創立義例取府州縣，提頭序列，如仕籍然。而摘志所載沿革山川，填註其下，志所未及者，參考補之，并考文錄・奏議，關切邊防・河防大計者，隨地附見之。

35 關於『大明官制』記載的內容，參見大澤顯浩「地理書と政書—掌故のあらわした地域—」（『明末清初の社會と文化』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96）。

36 『彙輯輿圖備攷全書』凡例

一，一統志止載郡之沿革，而稅糧屯田等項不載。

37 參看海野一隆「明・清におけるマテオ・リッチ系世界圖」（『東西地圖文化交渉史研究』清文堂，2003）。

38 參見海野一隆「漢民族の華夷思想と地圖」（『東洋學報』79-2，1997）。

39 參見船越昭生「在華イエズス會士の地圖作成とその影響について」（『東洋史研究』27-4，1969）。

40 海野一隆「正保刊『万国総圖』の成立と流布」（同『東西地圖文化交渉史研究』365-370頁），三好唯義編『世界古地圖コレクション』（河出書房新社，1999）46頁，101頁。

41 海野一隆「漢民族社會における歴史地圖の変遷」（『東洋地理學史研究（大陸篇）』清文堂，2004）所介紹的萬曆間刊行的梁輒「乾坤万国全圖古今人物事跡」以及崇禎十七年曹君義「天下九邊分野人跡路程全圖」（英國圖書館所藏），還有康熙二年（1663）姑蘇王君甫發行的「天下九邊万国入跡路程全圖」（橫濱市立大學圖書館以及神戸市立博物館（南波コレクション）所藏。日本將之改稱為「大明九邊万国入跡路程全圖」並屢屢翻印）之類的單張地圖上，其西北角記載了西歐的地名。